



城

我与北京的

八十年

孔庆普——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城

我与北京的

八十年

孔庆普——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 / 孔庆普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60-8974-6

I. ①城… II. ①孔…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0690号

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

(CHENG:WO YU BEIJING DE BASHI NIAN)

作 者：孔庆普

责任编辑：郭 国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开 本：71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19

字 数：271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974-6

定 价：42.00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录

推荐序 / 001

前 言 / 007

一九三七年之前 / 013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 / 021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 / 031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 / 037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 / 063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 / 171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 / 191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 / 203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 / 209

一九七七年之后 / 233

消逝的桥与河 / 241

茅以升与我 / 259

单士元与我 / 263

附录 讲座与问答 / 267

跋 / 295

推荐序

现今中国，年长者写回忆录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要真正写出一本好的回忆录，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一本好的回忆录，必须满足以下一些条件：第一，显现个人历史和所处时代，特别是与历史大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关联性。因为至少 20 世纪以来，没有国人的个人命运可以摆脱时代变迁的影响；第二，需要有个性（个体）的独特历史记忆角度及其观察记录；第三，提供比较翔实和准确的历史文献；第四，叙述的话语自然、平和、简洁，而不是过度文字化，或者说教，甚至煽情的。简言之，一部好的回忆录，并不取决于作者原本的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作者能否对自己所经历的特定时空有一种深沉的，却又是超脱和淡然的记录，在字里行间，给人留下思索的天地。这样的个人回忆录，不仅有历史价值且能存留于世。如今，具有历史价值和存留于世的回忆录其实少之又少，而孔庆普先生的这本不过十几万字的回忆录却充满历史价值，势必存留于世。具体来说，它有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历史跨度长。孔庆普先生出生于 1928 年，今年已经 88 岁了。他以个人所见所闻为主线，串联了自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前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在书中看到：七七事变之前，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一个世家的方方面面；日本侵略及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瓦解；抗战之后中央军如何进入北平，那时的货币经济、石景山钢铁工业、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解放军围城；1949 年以后三十年间接连不断的运动，从三反运动、“打老虎”、“大跃进”、“除四害”、大炼钢铁、大搞

技术革新、困难时期的粮食定量、职工停薪留职自谋出路、采取生产自救措施，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完结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事件。

第二，以自己的职业生涯折射北京城的命运。孔庆普先生是学土木工程出身，一位典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终其一生与北京市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到80年代晚期的市政建设，特别是北京大部分城楼、牌楼、桥梁的修缮和拆除，还有少数鲜为人知的城楼、牌楼、桥梁的抢救紧密相连。这本书告诉了读者：这个北京城在1950年曾经有过环城花园建设的规划；1951年曾经有过道路、桥梁、城楼等普查、建立了城里街巷名称档案、城墙城门技术档案，开始城墙修缮工程；1952年，刘少奇关于要把北京建设成一个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响建设的障碍物的指示，置北京于拆毁老城墙、城门、牌楼的万劫不复之中。当时，岂止梁思成，包括彭真在内的北京市领导人都不能理解。彭真说：“拆城墙可是一件大事情，五百多年的北京城说拆就拆，恐怕老百姓都不同意。”然而，一切已经不可逆转，1954年拆除了宛平城城门、地安门、宣武门；1955年拆除了西长安街的双塔寺；1956年拆除了阜成门，切去了团城南边一片；1957年拆除东直门；1958年拆除中华门、崇文门；“文化大革命”初期拆除了西直门。书中也记载了拆毁和埋于北京城地下的各类古桥名单，例如：甘石桥、江米桥、玉和桥、望恩桥、宣武桥、崇文桥、三里河桥、正阳桥，等等。读到这些，我自然是与孔庆普先生一样陷入难以释怀的悲哀和伤痛之中。为北京城悲哀和伤痛，为中国的历史悲哀和伤痛，为一部文明史和建筑史悲哀和伤痛。这里的每一座牌楼、城楼和古桥，每一段城墙，其实都是历史和文明的凝结，没有这些牌楼、城楼、城墙和古桥的北京，早已是一个残缺的北京。可以不夸张地说，任何一座被拆除的城楼牌楼和古桥，其价值都超过我们眼前一片一片的高楼大厦。如果说，梁思成先生与当时的决策者争论的是保留北京古城的意义，他为决策者无视自己的主张而痛心疾首，但是，梁思成毕竟没有亲手拆毁他钟爱的北京城。而对于孔庆普先生来说，他有着与梁思成先生一样的对北京城的那份情怀，那份眼界，直接

参加了早期的修复，却又不得不参加接踵而至的持续拆毁，情何以堪！

第三，通过亲身经历的片段，让人们得以窥见已经消失的时代。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一些小环境的记录。例如，作者出生之地：

“府邸的总体布局是前宅后园，中间是一条巷路，巷子的南口有一座大门，西厢是老宅，东厢是新建的院落。西厢南北三进院，后院有一棵大槐树，据说是毓辈老爷爷栽种的，树干三人合抱，树冠荫庇庭院。前院有一照壁，绘有松鹤图，前院朝南有街门，平时不开，每逢年节才打开。”“街门洞里楣上挂一蓝底金字匾，书写‘雪志冰心’。东厢是新建的四合院，南屋五间，中间是穿堂门，门楣上有砖雕。东西配房各四间，北屋也是五间，高台基双楹廊。”1937年以前，跟二姑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住在龙头井羊角灯胡同6号。“街门外有一层石台阶，门扇和门框都是黑色，门扇上有一对虎头口衔铜铤吊，门框下面有抱鼓式门墩石。进门迎面是东房的南山墙，是白底‘福’字照壁。”“院内靠近西墙有两棵枣树，树下有一个不大的鱼缸，养着几条小金鱼。东厦子前面有一个渗水井，刷锅水和洗衣裳水都是倒在渗水井里，因为胡同里的路面比院内地面高，院里的雨水也是流进渗井里。”

再例如，抗战之前的北京钟楼和鼓楼之间的小市场：

“南头都是卖小吃的布篷，各种小吃多半是清真食品。也有卖饭的大罩篷，卖饭的都是汉民，有抻面、烙饼、棒子面贴饼子和粉条豆腐杂烩菜。……中间是卖针线、绒花儿、花枕头顶和花鞋面儿的，卖小孩儿衣裳的，也有卖大人衣裳的。北头是说相声的、唱小戏儿的、唱大鼓书的等。”

第二类，大历史下的小故事。例如，1949年惩治天桥的“南霸天”场景，包括这个“南霸天”的穿着细节：

“南霸天的模样是，光头、大胡子，上身穿黑夹袄，前衣襟敞开，里面套一件白褂子，挽着白袖口。下身穿黑裤子，扎着黑色绑腿儿，脚穿礼服呢面儿千层底布鞋。……斗争会开完以后，把南霸天押上一辆卡车，拉到先农坛西南角的城墙根，执行枪决。”

再例如，“大跃进”时期的“除四害”：

“城里家家户户的房上都有年轻男女，拿着洗脸盆等物件敲打，有人拿着竹竿儿上端绑一块布晃悠。眼看着麻雀在天空飞着飞着突然就掉下来了。捡到的麻雀都要交到街道。”

第三类，真实的经济生活。例如，困难时期调整粮食定量：

“1955年1月开始实行全民粮食定量制度，1959年7月，调整粮食定量，重体力劳动者由每月40斤改成每月36斤，一线干部由每月36斤改成每月34斤，轻体力劳动者和后勤干部由每月34斤改成每月32斤，家庭妇女和学生等人员由每月30斤改成每月28斤半。其中一半是细粮，一半是粗粮。”“1960年2月1日，调整细粮供应量，重体力劳动者和一线干部每月细粮6斤，轻体力劳动者和后勤干部，以及其他人员每月细粮4斤。”“每家每户发一个粮食供应证（俗称购粮本儿）和一个副食供应证（俗称副食本儿）。街道管粮食和副食的干部，每月月底到各家去发下月的粮票儿和油、糖、肉、菜、饼干等票儿。每年12月20日发下一年的布票儿。”

再例如，关于市总工会推广食品双蒸法：

“采用米饭双蒸法，具体做法是，每碗二两米，先用水泡半小时，第一次蒸熟后，凉半小时，再蒸一次，二两米可以蒸出满满一碗饭。”“大家食用后说，这纯粹是自己糊弄自己，米饭的体积增大了，吃进肚里当时显得饱了，一会儿就下去了。明知是自己糊弄自己，也得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啊。”

第四类，一一写出人生经历中有过这样或那样关联的人物名字。书中众多人名，或简或繁加以介绍。这些人物可以分成这样几类。其一，家人三十余位。对孔庆普先生有养育之恩、支持最大的是两位伯父——大伯父孔宪文（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系，是中国第二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铁路——淮南铁路总工程师）、二伯父孔宪武（1897—1984，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植物分类学家），以及二姑、姑父曹经武（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授）。经济上帮助过他的人还有陈孝开（北京大学土木系主任）、曹安礼（北京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等。其二，彼此有工作配合和相互支持的人，比如单士元（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郑孝

燮（建设部规划设计院顾问）、刘仙洲（清华大学教授）、茅以升（1896—1989，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和他的助手罗英（桥梁工程师）、梁思成（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罗哲文（中国文物研究所主任）、赵迅（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胡玉远（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以及对作者一生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许京骐先生（1919年生人，原北京市建设局局长）。其三，见面（多系汇报城墙和城门情况）较多的是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有过几次会议的人物，像当时（1951年）的北京市市长彭真（1902—1997）、副市长张友渔（1898—1992）、吴晗等人。其四，一些虽无过多接触，但因“文革”而死的人。

我写到这里，感慨之至，人老了，能够记住和记载人生中那些遇到过、共事过、受过资助、得到帮助，特别是影响自己人生轨迹的，以及遭受不幸的人们，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感恩，也是一种情怀。

以上特点，并不足以反映孔庆普先生回忆录的全貌。每一位读者，只要认真阅读，都会因自己的背景、兴趣和价值偏好而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这就是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举个例子：孔庆普先生在跋中补充了1956年公私合营的一个情景：他所在的北京建设局有位工程师叫张连壁。此人还有一个身份是“东升祥绸布店”的东家。党支部书记问张连壁对公私合营的看法，张连壁说，非常拥护。接着又说，他的叔和婶，白天上街敲锣打鼓，晚上回家老夫妻抱头大哭。寥寥数行，让我们看到了公私合营大历史背后一个小业主的真实情感。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多年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反思、研究多是集中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上，而“文革”时的市民日常生活，鲜有记录。本书提到了有关“文革”期间“大字报”的两个片段。其一是贴大字报的糨糊：“贴大字报和标语要用大量的糨糊，机械所北面是化工试验厂，他们研制成功一种合成糨糊。该厂有两派，他们分别和市政处的两派有联系，互称咱们是一家。市政处的两派职工贴大字报和标语用的糨糊，都是去化工试验厂要，各找各派要来的（无偿赠送）。”其二是天安门前的旧大字报哪儿去了？“学校都停课了，孩子们都跑着玩儿，有两

名工人利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家孩子制作垃圾车。用角铁焊成一个三角形，前端安装一个轴承，再车一根长轴，焊在后边，两端各装一个轴承，成为小车儿的底盘儿。上面放一个竹筐，用铅丝把竹筐固定在底盘上。孩子的双手扶住竹筐，一只脚踩在车盘后轴上，另一只脚蹬着地，跑起来还真快。……这些孩子们每天晚上，结伙蹬着竹筐车到天安门去撕大字报和标语，第二天卖废品。”人们难以想象，“文革”期间，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大字报竟然“补贴”了当时某些老百姓拮据的日常生活。

孔庆普先生历尽沧桑，而这本回忆录，从头到尾，如同一幅历史白描，无论写日常工作还是历史事件，决然没有文人墨客式的“抒情”，没有“意识形态”的说教，没有道德制高点，甚至没有评论，但是，却不放过细枝末节，笔到意到，一丝不苟。在平实的叙述中，显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内敛”，让你感受到一种历史“美学”，以及笔底流淌的深厚含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倡“微历史”，即通过一个人一件事的有限历史信息，集合成大历史、宏观历史。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微历史”，老百姓的历史是有其价值的。但是，在提倡“微历史”的同时，要避免“微历史”的庸俗化。依我所见，并非所有“微历史”都值得记载，如同今天走在街上，让每一个人把他今天做的事记载下来，应该说绝大多数人今天的所作所为并无记载的意义。如果“微历史”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记载，如同一本本流水账，不能折射出一个大历史，其意义和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再说一遍，孔庆普先生的这部回忆录，是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大历史。它将个人的一生和北京城数十年的变迁重合在一起，由一个个体承载如此沉重的“时空”，可谓“微言大义”。对我这个血液里流淌着北京基因，漂泊海外数十年的人来说，打开这本回忆录，就如同打开那沉重的北京城门；而当我合上这本回忆录，如同轻轻掩上北京城门。这之后，则是对那个消失的北京，难以消弭的怀念。

朱嘉明

2016年正月于西北

前 言

余自幼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八十余年，从总的情况来说，还算是一帆风顺，灾难不多。八十多年来，曾经历过一次灾难，三次痛苦事。一次灾难是1940年初冬，在家乡被贼人绑架，关在一个小黑屋里，每天吃两顿高粱面贴饼子和白菜汤，共计八天九夜。

第一次痛苦事，是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队强迫我承认自己有“剥削阶级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有“脱离群众作风”。我出身于科教世家，我哪来的“剥削阶级思想”？哪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第三次大会上做思想检查时，我屈辱、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四清工作队队长说：“老孔同志这次痛哭流涕地深挖了剥削阶级思想根子，大家说，通过不通过？”台下人一齐说：“通过。”我回到办公室后痛哭了一场。

第二次痛苦事，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打、批斗、陪斗、受辱，被看管十四天半，度日如年。

第三次痛苦事，是让我主持拆除城楼，特别是拆除我刚刚修缮过的城楼，违心痛苦地安排拆除施工计划，含泪指挥施工，这是别人不可能体会到的极其痛苦的事情。

工作四十多年来，始终未离开市政部门，以从事市政设施养护管理为主业。北京的古代桥梁，维修、加固、改建、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设计和施工。在桥梁养护实践中，进行古桥结构研究。拆除古桥过程中亲自进行结构考察。北京的城墙、城门及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也是我主持

维护、修缮，到后来又是我主持拆除。

1989年分配我撰写《北京基础设施·桥梁部分》，此后又撰写《北京城市建设史·桥梁建设史》，1992年，分派我撰写《北京志·桥梁志》，而后将《北京志·桥梁志》与《北京志·道路志》合并，改编成《北京志·道桥志》。

1997年年底（69岁）退休后，续修我们孔家的家谱——《忠恕堂家谱》。此后，又帮助北京和高邑县孔氏家族续修《孔子世家谱》。光阴荏苒八十多年已经过去，回眸沧桑岁月，匆匆过去。

从事市政设施养护事业四十八年，我认为我有责任将数十年来调查、维修、拆除的古桥、城墙、城门、牌楼、门楼的技术状况及实施过程记录下来。2008年开始撰写《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等主要专著。一晃80多岁了，如今的记忆力不比当年，只是那些往事历历在目，回忆起来记忆犹新，而且，自觉身子还硬朗，趁现在我的脑子还不糊涂，于是我开始撰写这篇回忆录，作为《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和《中国古桥结构考察》的补充。

老北京的变迁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元大都城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8年），建成于至元八年（1271年），元大都城的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四面城墙均为土城墙。如今还有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北土城、西土城等地名。

明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开始修筑明朝京城（内城）城墙，在元代北城墙以南2950米处修筑明城北面城墙，继而改造东西两面土城墙，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元代南城墙以南约800米处修筑明城南面城墙。正统四年（1439年）完成城墙改造（增建城垛、城角箭楼等），并改建、增建城门瓮城、城楼、箭楼、闸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增修

南城（外城）城墙，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全面完成南城城墙建设。

根据实地测量，内城东西城墙的方位是按照“子午线”（地球磁力轴线）设定的。这条“子午线”与世界通用的按照北极星测定的坐标轴线之间有一个小夹角，子午线的偏转角约2度。紫禁城及三大殿的中心线也是按照子午线设定。

内城的平面图形接近长方形，北面城墙长6800米，东面城墙长5375米，西面城墙长4825米，南面城墙长6850米。东西两面城墙基本平行，内城的南北向中心线，在紫禁城中心线西边约300米处。城墙的基础是随地形的高低而建，城墙的高度大致相同，因此，城墙上顶则呈平缓的波浪形。

南城（外城）的平面图形接近“凹”字形，东、西、南三面城墙均不够直顺，尤其是东面城墙明显弯曲，北面的城墙分东西两段，分别对接于内城东西城墙的南段外侧，两段城墙并不在同一直线上，西段城墙偏北，东段城墙偏南。外城由于方位不正，形状不规则，所以不存在中心线。

东面城墙长3270米，西面城墙长3450米，南面城墙长7850米，北面城墙西段长510米，东段长515米。

外城城墙的基础也是随地形高低而建，城墙的高度大致相同，城墙的上顶呈较为明显的波浪形。北京城内外城的总平面图形，大致呈“凸”字形。

关于1937年之前北京的城墙，根据北平^①市工务局档案记载，内城的城墙基本完整，缺少东北和西北城角箭楼，缺少德胜、安定、东直、朝阳、宣武五座城门的瓮城，缺少东直、阜成、宣武、崇文等四门的箭楼，缺少正阳门瓮城^②，增加了正阳西门、正阳东门、和平门等三座城门。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全部存在，基本完整。

① 北平，北京的旧称。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1937年，日伪政府又将北平改为北京（并未得到中央政府和人民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沿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恢复原名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设于北平市，同时将北平市改名为北京市。

② 正阳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前门，正阳门的瓮城已经于1915年拆除。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我在1950年秋季所做的初步调查，内城的城墙基本完整，又增加了建国门和复兴门。外城缺少了广渠门的城楼和箭楼，其余六门的城楼和箭楼存在，城墙总体基本完整。

1951年春季，在城墙和城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我又组织调查组进行详细调查并测绘，建立起《城墙技术档案》和《城门技术档案》。是年4月，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划拨给北京市15亿元（旧币）^①修缮城楼专款，建设局接到15亿元修缮城楼专款以后，局长决定让我（当时我刚调到养路工程事务所不久，依然负责城墙、城上建筑物等古代建筑修缮与管理）在林是镇顾问的指导下主持城楼修缮工程。

林是镇带领我去找文化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原属北京市建设局文物整理工程处），请文整会主任俞同魁协助作城楼修缮工程设计及编制工程概算和预算。

1951年9月上旬，先后开工6项工程——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阜成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及箭楼的修缮。当年12月20日竣工4项，剩下的安定门城楼和安定门箭楼收尾工程，于翌年6月完成。

1953年至1958年是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时期。1951年年底，上报市政府1952年的城楼修缮工程计划，到了1952年3月仍不见批复，局长派秘书张文海去市政府了解情况。据秘书厅有关人员介绍，领导要把北京建设成一个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响建设的障碍物，包括城门和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等，城楼修缮工程除未完工程继续做完外，不再立新项目。

城墙、城门、牌楼、门楼拆除工程自然又都是我的事情。从1952年9月拆除西便门开始，到1958年9月拆完永定门，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

^① 指的应该是法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法币大量发行，通货膨胀，1951年左右100元法币相当于可以买到一张纸。

“文革”期间北京的社会秩序大乱，城墙和城门的管理单位——市政工程管理处也处于半瘫痪状态，拆除城墙的任务全部由基建工程部队实施，包括西面城墙的大部分（复兴门以北）、北面城墙、东面城墙的大部分（建国门以北）。其中，西直门箭楼在地下铁道二期工程规划中保留，拆城墙施工期间，由于工程部队不了解情况，稀里糊涂一并将箭楼拆除。

到1969年年底，内城的城墙尚存四段——东南城角以北和以西各一段，西南城角以北和以东各一段。1970年为修筑京周路（北京至周口店），拆除西南城角箭楼及其以东城墙。1987年文物局和西城区政府又将西南城角以北的城墙拆除，重建一段称为“西便门城墙遗址”的新城墙（假城墙），以破坏古城墙为代价，新城墙设计与建造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新工程，可以获得大量的投资或者批款。

纵观1368年到1969年，历经明、清两朝，北京的城墙基本上成型；民国时期，国民党执政，也保留了北京城清代时的布局；1949年成立新中国以来，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却基本上被扫平了，剩下的只有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城角箭楼及其以北和以西各一小段城墙。

历史是不能倒退的，再想还原北京城墙和城门是不可能的了，再造古城都是虚妄和做作。以2004年修建新永定门城楼为例，城楼的规模改小，结构改简单，完全重新设计和建造，花费过多的财政拨款，得不偿失，完全没有任何有利于人民的意义。

我在《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一书中，以结构考察为重点，附带记述了城墙和城门的情况。我想在回忆录中，就城楼修缮和拆除工程，再补充一些城楼的技术文化内容。

北京的古城墙、城门修建工程，明、清两代都是由工部侍郎直接主持或指挥，是古代杰出工匠和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城楼的建筑形式设定为，歇山顶重檐两层三滴水有迴廊楼阁式。此种结构形式被建筑业评为最壮观、最美丽的建筑形式。明代以后，重修或重建全国各地，乃至长城上的关门城楼时，也都是仿照北京的城楼形式。

一九三七年之前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高邑县^①武城村，府邸在村东口路北，门牌1号。府邸的总体布局是前宅后园，中间是一条巷路，巷子的南口有一座大门，西厢是老宅，东厢是新建的院落。西厢南北三进院，后院有一棵大槐树，据说是毓辈^②老爷爷栽种的，树干三人合抱，树冠荫庇庭院。前院有一照壁，绘有松鹤图，前院朝南有街门，平时不开，每逢年节才打开。

街门洞里楣上挂一蓝底金字匾，书写“雪志冰心”。东厢是新建的四合院，南屋五间，中间是穿堂门，门楣上有砖雕。东西配房各四间，北屋也是五间，高台基双楹廊。

我们家的堂号是“忠恕堂”，家训是“礼孝诚信”。

忠恕堂是一个大家庭，我爷爷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三。二爷爷^③有四个儿子^④。

1937年以前，我大伯父孔宪文在淮南铁路任总工程师，二伯父孔宪武是北平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父亲孔宪章在平张公路^⑤宣化工段任工务员。我大叔孔宪周在保定当医生，二叔孔宪钧在北京大学读书，三叔孔宪民、四叔孔宪斌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大娘、二大娘、母亲和大婶子，在家帮

① 就在石家庄的南边。

② 辈，辈分是用字谱来排列的，一般一个宗族的同辈人的人名都将这些辈分字置于姓之后。如毓辈老爷爷指的就是孔姓后带有毓字的祖辈。

③ 即叔祖父，排行第二，称为二爷爷。

④ 即堂叔父，也就是后文提到的大叔、二叔、三叔和四叔。

⑤ 指当时北平至张家口的公路。